

长江沿江 城市与 中国近代化

张仲礼 熊月之 沈祖炜◎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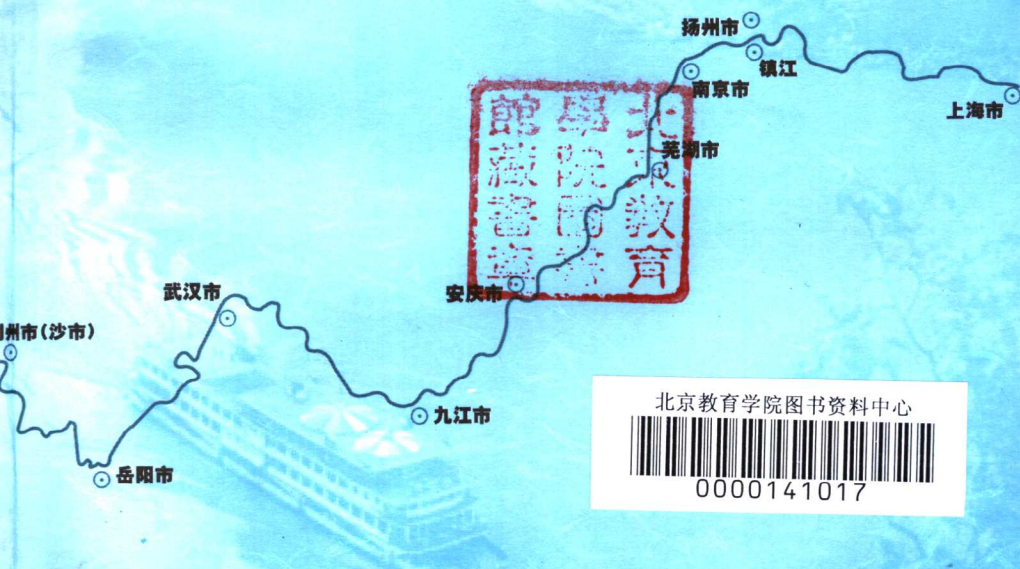


上海人民出版社

长江沿江城市与 中国近代化

张仲礼 熊月之 沈祖炜 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长江沿江城市与中国近代化/张仲礼,熊月之,沈祖炜主编.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ISBN 7-208-04243-8

I. 长... II. ①张...②熊...③沈... III. 城市史—研究—
长江流域—近代 IV. K2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50398 号

责任编辑 苏貽鸣

封面装帧 杨德鸿

长江沿江城市与中国近代化

张仲礼 熊月之 沈祖炜 主编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5 插页 4 字数 577,000

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200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100

ISBN 7-208-04243-8/K·969

定价 60.00 元

序 言

张仲礼

所谓现代化,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城市化。自 1978 年以后,我国进入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也进入了城市化建设新时期,城市在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与此相伴而生的,是对城市与城市史的研究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从 1979 年开始,对一些大城市历史的研究,就成为中国历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在国家制订的“六五”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中,《上海史》率先被确定为重点项目。在“七五”规划中,《近代上海城市研究》、《近代天津城市史》、《近代重庆城市史》与《近代武汉城市史》被列为重点项目,分别由四地学者承担。这在中国城市史研究史上,有里程碑意义。在“八五”规划中,《近代东南沿海城市研究》、《近代华北城市研究》、《长江上游地区城市研究》又被列为国家重点项目,由单个城市研究扩展为城市群与城市带的研究,分别由上海、天津、四川学者承担。

随着这些研究项目的推进,有关学者发表了数量相当可观的关于城市史研究的著作和论文,先后在上海、天津、成都、武汉召开过多次“中国城市史研究学术讨论会”,就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对象、理论、方法,以及有关城市历史的特点,进行了讨论。受

此影响,对北京、南京、昆明、广州、福州、厦门、芜湖、九江、宁波、大连等城市的历史研究,也陆续展开。城市史研究在中国蔚成风气,繁花似锦。

上述重点项目中,《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均由我负责。这两个项目均按期、优质完成,其中,《近代上海城市研究》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二等奖,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三等奖,《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二等奖。

在申报国家“九五”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时,我们又适时地以《长江沿江城市与中国近代化》为题提出申请,有关部门对我们的项目颇为赞赏,但格于一个人不能连续三次获得资助的规定(我已连续两次获得资助),这个项目后来被批准为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重点项目。

从“七五”、“八五”到“九五”,我们的研究视野从上海、沿海到沿江,完成了城市史研究三部曲。中国城市的历史相当悠久,但以近代化而论,则是从上海、沿海、沿江城市起步的。研究这些城市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地位,及其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可以明了中国近代城市演变的轨迹,为中国城市史研究开辟一片学术天地,也可以总结出一些经验与教训,为今天的城市建设提供借鉴。这是我这些年来不避艰难、勉力从事城市史研究的原因。

城市史是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内容的综合性课题,需要多种学科知识和人才的配合。从上海、沿海到沿江三部曲的完成,都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经济研究所诸多学者通力合作、团结攻关的结果。十几年来,这两个研究所的有关同志,在熊月之、沈祖炜的带领下,各展所长,密切配合,相互切磋,完成了任务,也培养、锻炼了队伍。现在,上海社

会科学院已成为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研究中国城市史的重要基地,历史、经济两个研究所的不少学者,在城市史研究方面,卓然成材,或是某一方面的学科带头人,或已成为城市管理者。看到这些成就,我确实感到由衷的欣慰。做项目,出成果,出人材,这是我这些年来十分乐意从事城市史研究的另一个原因。

关于本书的内容,我在这里略作介绍:

本书所指长江沿江城市,主要为宜宾、重庆、万县、宜昌、沙市、岳阳、武汉、九江、安庆、芜湖、南京、镇江、南通、上海。这些城市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地位重要,影响巨大。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有的处于改革开放的前沿、龙头地位,有的处于亟待大开发的中西部地区。长江,作为天然的纽带,将他们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本书除“总论”之外,凡分 15 章。“总论”集中地讨论了长江沿江城市的历史源流,分析了长江作为中国黄金水道的意义,论述了近代一百多年间历次重大战争和政治事件对沿江城市发展的影响,开埠通商与沿江城市发展的关系,讨论了沿江城市在近代中国的地位,同时对于学术界关于沿江城市研究成果作了梳理。第一章至第六章集中研究经济方面的专题,包括沿江城市的开放与对外经济关系、商业和埠际贸易的发展、城市之间的金融联系、工业发展推动下的沿江城市、城市交通结构近代化、城市化影响下周边农村经济结构的变化。第七章至第十二章集中讨论了社会、市政方面的专题,包括沿江城市的人口发展、民风习俗、居民素质及其特点、会馆与公所、同乡会与同业公会,沿江城市帮会变迁、市政建设与公用事业发展。第十三章至十五章集中研究了文化方面的专题,包括沿江城市与西学传播、科技的发展传播与社会变迁、基督教的发展状况。对于近代沿江城市发展的主要特点,书中作了归纳,主要有以下九点:

第一,开埠通商是长江沿江城市在近代迅速发展的契机。长江沿江重要城市,在近代大多是通商口岸,开埠通商,淡化了沿江城市“城”的功能,增强了“市”的功能。开埠通商使沿江城市获得空前的发展机遇,物流、人流集散地功能增强,腹地扩大,各个城市在其辐射区域(有大有小,也因时而异)的经济、文化中心的功能得以增强。

第二,轮船航运业的开拓是近代沿江城市兴盛的前提。科学技术的进步,近代轮船航运业的开拓,促进了沿江城市的发展,促进了沿江城市之间的有机联系,形成了在经济、文化甚至政治上休戚相关、联系密切的沿江城市带。轮船不通,长江大水“利”的方面便无法突显,沿江城市就只能是残星点点,不能连成一气,也不能形成“城市带”。

第三,和平的环境是沿江城市平稳发展的重要条件,战争、自然灾害对沿江城市造成很大的破坏。

第四,近代长江沿江城市多是走的依托长江、背倚腹地、发挥地理优势,由商业化而工业化而城市化的发展路径。

第五,个别城市的畸形发展。在一些特定的时段,由于特殊的政治格局,带来了上海、汉口等城市的繁荣。日本的野蛮侵略,严重破坏了沿江大多数城市的发展,诸如上海、南京、芜湖等,改变了这些城市的正常发展轨道。但是,由于迁都,由于工厂内迁、人才内迁,带来了重庆等个别城市的畸形繁荣。

第六,长江沿江城市是中国近代化先行地区。长江沿江城市引导和制约着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国近代化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在沿江城市的发展过程中都可以找到答案。

第七,近代中国最发达的是沿海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最不发达的是西部地区,长江是将中国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区有机联系的天然通道,充分发挥长江黄金水道的作用,有利于协

调三大地区的健康发展。

第八,长江沿江城市在近代并不是均衡发展的,呈现明显的梯度效应。上海、武汉、重庆是下游、中游、上游地区三大中心。

第九,上海既是长江下游地区的中心,又充当了整个沿江城市近代化的领头羊。其他沿江城市则接受上海的商业、金融、工业等领域的技术、产业、资金、信息等全方位的转移。

这些归纳是否恰当,尚待方家指正。我们努力作此归纳和总结,意在从个性中找出共性。

回顾十几年来主持城市史研究的历程,我感慨很多,不禁想起许多热情支持过我们的学术界朋友,他们或与我们合作进行研究项目,或参加我们举办的学术研讨会,或给我们提供各种资料。诸如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研究所所长魏斐德教授,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系叶文心教授,康奈尔大学历史系主任高家龙教授,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所主任裴宜理教授,路易斯维尔大学梅爱莲教授,美国西方大学陈锦江教授;德国海德堡大学的瓦格纳教授、叶凯蒂博士;英国牛津大学的科大卫教授;日本东京大学滨下武志教授,新泻大学的古厩忠夫教授;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白吉尔教授;澳大利亚的黎志刚教授;台湾近代史研究所的陈三井教授;香港中文大学的郭少棠教授、梁元生教授。还有原是我院学者、后来留学美国的卢汉超教授、程麟荪教授,留学日本的蔡建国教授。我们的城市史研究得到了国内、市内许多学者的热情鼓励和支持,我们的成果中,包含了他们的智慧。京、津、蓉、穗、汉等地的王庆成、张磊、隗瀛焘、皮明麻、罗澍伟等同志,对于推动中国城市史的研究有着重要贡献。丁日初、丁凤麟、马长林、马伯煌、冯绍霆、朱金元、刘其奎、汤志钧、李华兴、杨立强、吴乾兑、吴景平、汪熙、沈渭滨、陈曾年、陈绛、洪霞管、姜铎、姜义华、施宜圆、徐雪筠、徐鼎新、唐振常、黄美真、黄逸

平等同志,都是城市史研究的实际参加者或热情支持者。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多年来一直重视、支持上海史、城市史的研究,提供了研究经费和出版方面的有力资助。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历任领导,从老领导黄逸峰到现任院长尹继佐同志,一直热情支持对于中国城市史的研究。这是上述三部曲能够顺利开展、圆满完成的重要原因。

我已经 81 岁了,以后还会尽己所能地关心、支持城市史研究,力所能及地做我喜欢的研究工作,但我不会再领衔主持关于城市史研究的重点项目了。所以,藉此机会,谨向上述所有支持、关心我所主持的城市史研究项目的学术界同行、领导表示深深的谢意!也向参加上述城市史研究项目的历史、经济两研究所的各位学者表示深深的谢意!

2001 年 6 月 10 日

目 录

序 言	张仲礼	1
总 论		1
一、长江沿江城市的历史源流		1
二、近代长江沿江城市发展脉络		12
三、长江:黄金水道的意义		27
四、开埠通商与沿江城市发展		31
五、沿江城市在近代中国的地位		37
六、沿江城市研究成果梳理		45
第一章 沿江城市的开放与对外经济关系		53
一、19世纪长江沿江城市的开放和对外贸易		53
二、20世纪前期长江沿江城市的外贸及其互动		66
三、长江沿江城市的外资状况和国外先进科技的引进		88
四、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关税改革对长江沿江城市的影响		98
五、对外开放与长江沿江城市的早期现代化		112
第二章 沿江城市商业和埠际贸易的发展		127

一、沿江城市的商业发展	128
二、沿江城市的中外商业企业	138
三、上海与其他沿江城市的贸易	155
四、沿江城市同腹地的商业联系	161
五、商业发展的阻滞及其凋敝	167
第三章 沿江城市之间的金融联系	178
一、以银行为主体的近代金融业扩散发展	178
二、以上海为枢纽的城市金融网络渐次形成	193
三、以资金流动为内核的金融往来日趋繁复	204
第四章 工业发展推动下的沿江城市	224
一、口岸通商与城市工业的产生	224
二、沿江城市工业带的形成与特点	238
三、沿江城市工业发展与中国的近代化	258
第五章 沿江城市交通结构近代化	272
一、长江航运业相对封闭状态及区域性环流结构 的重大突破	273
二、“苏州方式”及其历史启示	290
三、沿江城市间综合性近代化交通结构之形成	304
第六章 城市化影响下周边农村经济结构的变迁	316
一、周边农村产业结构的变迁	316
二、土地所有制结构的变动	337
三、农村社会生活的结构性变迁	348
四、农村经济结构变迁的历史意义	361

第七章 沿江城市的人口发展	368
一、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人口变动	368
二、民国时期长江沿江城市的人口发展	377
三、近代沿江城市人口结构和发展特点	405
第八章 沿江城市民风习俗	427
一、近代以前各地民风特色	427
二、通商开埠与民风嬗变	441
第九章 沿江城市居民素质及其特点	454
一、沿江城市人口素质社会构成中的异同	455
二、城市移民素质	466
三、生活环境和人口身体素质	475
四、相对发达的文化素质	481
第十章 从会馆、公所到同乡会、同业公会	489
一、传统会馆、公所的 类型 结构 和 职能	489
二、传统会馆、公所的 现代 转型	496
三、沿江部分城市同乡、同业团体的历史考察	501
第十一章 沿江城市帮会变迁	529
一、城市游民的膨胀与城市型帮会的崛起	530
二、城市型帮会的演进及其功能变异	553
三、城市帮会的类型分析	565
第十二章 沿江城市市政工程建设与公用事业发展	585
一、近代市政工程建设与公用事业起步的背景	585

二、市政工程建设的那三种类别	606
三、城市规划及成效	631
第十三章 沿江城市与西学传播	653
一、西学传播阶段	653
二、租界展示西方文明	657
三、西书翻译	670
四、报刊与西学传播	683
五、长江:文化走廊	704
第十四章 科学技术的发展传播与社会变迁	708
一、科技发展的外部条件	708
二、科技发展的内部支撑体系	716
三、科学技术的具体发展	732
四、技术传播与社会变迁	750
第十五章 从沿海到沿江:长江沿江城市基督教的发展 ...	765
一、上海是中国基督教的中心	765
二、“间接传教”在上海和长江流域	772
后 记	784

总 论

浩浩长江,西起青海,东入大海,流经青海、西藏、四川、云南、重庆、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上海等八省二市一自治区,全长 6300 公里,流域面积 180 多万平方公里,为中国第一大河。长江地势自西向东,依次降低,落差 5400 米,湖北宜昌以上为上游,长 4529 公里,水急滩多;宜昌至江西湖口为中游,长 927 公里,水势渐缓;湖口以下为下游,长 844 公里,江宽水深。长江干流部分西起金沙江、岷江交汇的四川宜宾,东至入海口,长 2813 公里。本书研究的主要是长江干流沿江城市。

长江历史与中华文明一样古老。考古学、历史学的研究已经表明,长江流域是中华民族文明发源地之一,长江和黄河同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在中华文明演进的过程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长江两岸产生了许多城市。这些城市作为人口、资源、信息的集约点,分别充当了不同地域范围内的政治、军事重镇或经济、文化中心,或两者兼而有之,在中华文明史上,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一、长江沿江城市的历史源流

长江沿江城市,从上游到下游,依次有宜宾、重庆、万县、宜昌、沙市、岳阳、武汉、九江、安庆、芜湖、南京、镇江、南通、上海。

这些城市产生于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各自的特点。

宜宾,古称戎州,又称叙府,位于四川盆地南部,金沙江与岷江汇合处长江北岸,有“万里长江第一城”之称。春秋战国时期,为古西南夷僰侯国地,汉置县,名僰道,已筑城。北宋始称宜宾,历为州、郡、路、府治所。宜宾地处要冲,由长江东面可达泸州、重庆,北经岷江可达乐山、成都,因此历来为军事重镇。近代以后才逐渐成为工业城市,所产“五粮液”为中国名酒,因而被称为“酒都”。1937年人口为802924人。

重庆,简称渝,古称江州,位于长江与嘉陵江汇合处,上游沟通四川盆地,下游与湘、鄂、赣、皖、苏、浙相联系。公元前316年,秦灭古巴国,设巴郡,治所设江州(今重庆市区),由于防卫需要,在此筑城。秦汉时,城邑已有一定规模。隋唐时为渝州治。唐代以前,这里一直是川东军事、政治据点。唐宋以后,因川东南经济的发展和长江上游航运的开发,这里成为川东及滇、黔各地货运转运站。宋以后,为重庆路、府治。明清时期,成为长江上游商贾云集、百物萃聚的商业中心。光绪十七年(1891年)开辟为通商口岸。1901年,辟设日租界。民国初年,废府存县,改称巴县。1921年军阀刘湘任四川省省长,在重庆城内设立商埠督办,1922年设立市政公所。1927年改市政公所为市政厅,1929年设重庆市。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国民政府西迁,重庆成为陪都,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发展为多功能综合性中心城市。1939年重庆改为行政院直辖市。重庆在鸦片战争以前,人口为17750户,65286人。民国元年,重庆城市人口近20万。1929年重庆建市时城市人口为238017人,1937年为475968人。成为陪都以后,人口增长迅速,1941年为702387人,1945年为1049450人。成为陪都以前,重庆市区面积约12平方公里,成为陪都以后一年间,市区面积迅速扩大到30平方公里。抗日

战争胜利,首都迁回南京以后,重庆人口有所回落,1949年以前维持在100万人左右。

万县,古称南浦,位于川东盆地边缘,长江北岸。唐贞观八年(634年)改万州,治所在南浦。明改称万县,属四川夔州府。清因之。万县地滨长江,形势险固,长江自此处向下,水急滩险暗礁多,自古以来船只由此向东不敢夜行,必在此住宿,这为万县添了许多商机,商业由此繁盛。1902年,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辟为通商口岸。1928年析万县城区置万县市,1935年裁撤。近代万县为川东第二都会。1937年全县人口780787人。

宜昌,古称夷陵。战国时属楚,西汉初年为县治,明代筑城,清初改称夷陵,后改名东湖县,雍正十三年(1735年)置宜昌府,治所在东湖县城。民国初年,府治撤销,东湖县即改为宜昌县。宜昌是鄂西重镇,紧靠三峡的西陵峡口,为长江中、上游分界处,是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等长江中下游地区通往四川的要道,有“西南门户”、“川鄂咽喉”之称。宜昌处于大巴山脉、武陵山脉之间,群山环抱,耕地少而土质贫瘠,当地农民兼商者颇多。东汉时,宜昌古港开始成为长江交通运输线上的重要舟船停靠点。北宋时,港口出现第一次繁荣。在开埠以前,宜昌已是一商业市镇,但规模不算很大,盛衰无常。当地的贸易主要与四川进行,输入川盐、砂糖、桐油、烟草等,输出土布、棉花、杂粮等。宜昌为土布集散地,鄂西之兴山、秭归、长阳、五峰、恩施,川东的巫山、巫溪、奉节等县,均为大山区,基本不种棉花,人民所需土布,均由此转运。1851年(咸丰元年),太平军攻克武昌,淮盐运鄂受阻,川盐大量行销湖北,宜昌港出现第二次繁荣。1876年,清政府与英国签订《烟台条约》,规定开放宜昌等四口为通商口岸。1877年,宜昌正式开埠,遂由传统港口演变为近代通商口岸。1936年宜昌县城内有人口10.5万人,店铺1300多家。

沙市地处汉口、宜昌之间,春秋时代为长江一渡口。唐代称沙头市,曾在此置镇将、副将、长史、参军、仓曹、仓督等。杜甫有诗咏道:“结缆排鱼网,连樯并米船”。宋代已是有巷陌三千的巨镇。明清时为江陵县属镇,清代设巡司长官。历史上明代已繁盛,据《荆州府志》述其景象:“贾客扬帆而来者多至数千艘船,向晚逢灯相映,照耀常若白昼”,为一区域性农、副、土特产集散中心。所产丝绸史称“荆锦”,闻名遐迩。对于沙市在地理、商业方面的重要地位,日本人作这样的描述:“地势据水陆之冲,在长江沿江的诸港中,无比之水利能使货物聚散自在,岸上人烟繁盛,岸下货船连系,镇内多财产富家,水陆俱殷实,使人犹想是三国时之江陵,所谓江陵不守则无以复襄阳,无以图巴蜀,无以图武昌,无以固长沙者,诚不失为重要之地也”。^① 19世纪末,沙市本地人口7万多人,寄泊沿江的船户商贾人口有10万以上。1895年签订的《马关条约》,规定沙市为通商口岸。1896年10月,沙市正式开埠。1907年,中日卷烟公司开办,是为沙市近代工业之始。1911年以后,胜家机器公司、荆沙普照电灯公司、三户织布厂、云锦机器织布厂相继创办。20世纪30年代,沙市为全国仅次于武汉、天津的第三大棉花出口市场,1911—1936年棉花出口平均占全国总出口量的11%以上。抗日战争前夕,沙市城镇人口约9万,各类店铺2200多家,当时沙市有“小汉口”之称。

岳阳,位于湖南省东北部,长江南岸。西晋太康元年(280年)置巴陵县,晋以后历为巴陵郡、巴州、岳州、岳州路、岳州府等治所。民国改名为岳阳县。地当湖南水道之咽喉,南迨三湘,北

^① 此为日本领事馆在给日本国内报告中所写的话,原载《湖北商务报》1899年7月21日。转引自张洪祥《近代中国通商口岸与租界》,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7页。